

錢賓四先生生平要略

錢賓四（穆）先生（1895 至 1990 年），江蘇無錫人。他七歲入私塾，十歲進無錫蕩口鎮的果育學堂，這是所新式小學。十三歲時，他入常州府中學堂，治學深受當時任教歷史、地理的呂思勉先生所影響。十六歲時，他因與同學請求校方修訂課程，未受接納，於是不參加四年級的年終試，並申請退學。十七歲，他轉入私立南京鍾英中學五年級，但在升讀六年級時，適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只好輟學。1912 年，錢先生十八歲，初在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任教。1913 年起，他先後任教於私立鴻模學校、無錫縣立第四高等小學、後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無錫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廈門集美學校、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蘇州省立中學。1930 年秋，因顧頡剛的推介，錢先生開始任教於北平燕京大學，時年三十六歲，一年後，即轉往北京大學歷史系，並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兼課。以後他更歷任西南聯大、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昆明五華書院、雲南大學、無錫江南大學等校教授。⁰¹

從以上簡述，可知錢先生所受教育，只限中學階段，但他刻苦自學，勵志鑽研，終於由鄉村小學教師，進而為中學教師，再進而為大學講師、教授，主講文史課程，在學術上有很大的成就和影響。1949 年，錢先生來香港，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在九龍油麻地偉晴街辦亞洲文商學院；1950 年，在深水埗桂林街創辦新亞書院；後得美國雅禮亞洲協會、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在土瓜灣農圃道籌建校舍。校舍落成，已是 1956 年的事了。1953 年，錢先生籌辦新亞研究所，在雅禮亞洲協會和哈佛燕京社的支持下，新亞研究所在 1955 年正式招收研究生。1963 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院校包括崇基、新亞、聯合。1965 年，錢先生七十一歲，因不耐校務的繁雜和辦學理念與當時中大管理層的差距，辭去新亞書院院長職，從 1967 年起在臺灣定居，撰述、講學不輟。1968 年 7 月，錢先生以百分之九十最高票，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錢先生晚年目力日弱，胃病嚴重，腦力日衰，仍有著述《晚學盲言》出版，到了 1986 年九十二歲生辰時，才正式告別杏壇，在素書樓講了最後一課。1990 年 8 月 30 日，錢先生以九十六歲高齡辭世，遺留下來的著述極為豐富，對今後學術的發展和學人的研究，必有很深遠影響。⁰²

錢賓四先生的重要著作

錢賓四先生著作等身，1994 年在錢師母胡美琦女士的授權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開始出版《錢賓四先生全集》，由《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內容分為：甲編思想學術、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著，共五十四冊。1998 年，完成全部整理、編輯、出版工作。2011 年，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錢穆先生全集》新校本，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作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的疏誤。至於《全集》原有的內容和註解、說明等等，新校本原則上保留原貌。⁰³

《全集》中包含的專書和單篇文章很多，要判定哪些是錢先生的重要著作，可能會引起見仁見智的爭論。如果不避認識不足、意見有偏之譏，我認為除單篇文章不計外，錢先生有

幾部專書，是特別受人重視的名著。下面是這幾部專書的簡介：

1. 《先秦諸子繫年》上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初版）。⁰⁴ 這部書在1923年開始撰寫，約四五年成書，共四卷，考辨文章一百六十三篇。內容是依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考證先秦諸子的學術師承和生平著述，上溯孔子生年（公元前511年），下逮李斯卒年（公元前208年），前後二百餘年先秦諸子的學術淵源流變得到疏理。顧頡剛的評論是：

錢穆先生的《先秦諸子繫年考辨》，雖名為先秦諸子的年代考辨，而其中對古本《竹書紀年》的研究，於戰國史的貢獻特大。⁰⁵

楊樹達在日記（1934年5月16日）也這樣記述：

出席清華歷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試會，散後，偕陳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錢賓四（穆）《諸子繫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⁰⁶

可見當時卓有成就的同輩學人，對《先秦諸子繫年》一書，都表示了極為推許之意。

2.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5月初版）。⁰⁷ 這是錢先生在北京大學講課的講義，由1931年起積五年增改而成；全書共十四章，並附年表。第一章略述兩宋學術概要，認為近代學術導源於宋學，不知宋學，則不能知漢學，更無法評論漢宋的是非。⁰⁸ 第二章至最後一章，分述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顏元、李塨、閻若璩、毛奇齡、李紱、戴震、章學誠以至康有為等諸家學術大要和師承關係，藉此說明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演變的軌跡。楊樹達在日記（1943年7月26日）中說：

閱錢賓四（穆）《近代三百年學術史》，「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所見甚正。文亦足達其所見，佳書也。⁰⁹

為什麼會「嚴夷夏之防」？因為這書是在抗戰前夕寫成的，所以民族意識表現得十分明顯。楊氏強調「文亦足達其所見」，指的是「所見甚正」的「注重實踐」和「嚴夷夏之防」。

3. 《國史大綱》上下冊（重慶：商務印書館，1940年6月初版）。¹⁰ 這是錢先生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學教授「中國通史」課的講稿，1939年在雲南宜良撰成。全書內容，分為「引論」和「八部」，共四十六章，以綱目體行文，提綱挈領，有系統地介紹了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顧頡剛指出，當時所見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之作。其中較近理想的，只有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周谷城的《中國通史》、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陳恭祿的《中國史》、繆鳳林的《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的《中國史綱》、錢穆的《國史大綱》等。¹¹ 顧氏更進一步指出：

其中除呂思勉、周谷城、錢穆三四先生的書外，其餘均屬未完之作，錢穆先生的書最後出而創見最多。¹²

《國史大綱》「創見最多」，應是當時學壇的公論。

關於《國史大綱》，嚴耕望先生在《治史答問》之「二十一」的意見是：

我想目前所有各種中國通史中，仍以錢賓四先生的《國史大綱》為最佳，內容既見識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幾部通史所能企及；而民族意識又很強烈，正合乎現在要求所有大學生修習「中國通史」的目的。¹³

嚴先生在〈錢賓四先生行誼述略〉中又說：

此書多具創見，只觀其章節標題，點出每個時代之動態及其特徵，已見才思橫溢，迥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氣沉沉者可比。尤極難能可貴者，往往能以數語，籠括一代大局。……其他勝義紛陳，不能盡列。而《引論》一篇，陳寅恪先生謂為近世一篇大文章。¹⁴

余英時先生在一篇悼念錢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國史大綱》，他這樣說：

《國史大綱》自然代表了他（錢先生）自己對一部中國史的系統見解。……我曾不斷提出《國史大綱》中的具體論斷，請他說明為什麼要這樣說，而不那樣說。……我漸漸明白原來他多年在北大等校講授中國通史的過程中，讀遍了同時代史學專家在一切重大關鍵問題上的研究文字，然後根據他自己的通史觀點而判定其異同取捨。¹⁵

因此，余先生特別指出：

《國史大綱》並不易讀。因為錢先生寫通史時惜墨如金，語多涵蓋，其背後不僅是正史、九通之類的舊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個民國時期的史學史。¹⁶

嚴、余兩先生是錢先生的高弟，他們的評論，應該是長期親炙錢先生和多讀錢先生著述的心得。

4.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香港：新亞研究所，1958年8月初版）。¹⁷ 本書收入錢先生四篇論文：〈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博士家法考〉、〈孔子與春秋〉、〈周官著作年代考〉，都是為兩漢經學今古文問題而發。內容主要在破除劉歆偽造古文經的謬說；發明兩漢博士治經分今古文的真相；闡述古今經學流變的大體；考辨《周官》的製作年代和古文經學與《周官》的關係。書中第一篇論文原名〈劉向劉歆王莽年譜〉，最初發表於1930年6月《燕京學報》第七期，主編顧頡剛在發刊時改為今名。這是錢先生轟動當時學術界的成名作，也是本書最重要的論文，體例仿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以年譜的形式，排列了劉向、劉歆父子的生卒、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體史事揭發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一書曲解史實、抹殺證據不可通之處。胡適在日記（1930年10月28日）中說：

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他不信《新學偽經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駁之。¹⁸

本書其他三篇文章，都是以經學問題為討論中心，在內容上與〈劉向歆父子年譜〉有呼應、

延伸、補充、發揮的作用。錢先生在本書的〈自序〉中說：

本書宗旨，則端在撤藩籬而破壁壘，凡諸門戶，通為一家。……本書之所用心，則不在乎排擊清儒說經之非，而更重在乎發見古人學術之真相。¹⁹

可以說，《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是錢先生打破經學門戶的藩籬，以史治經、以考證辨析經學疑難問題的示範之作。

5.《朱子新學案》五冊（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9月初版）。²⁰這是錢先生晚年精心撰寫的巨著，1964年開始撰寫，1969年完成，又在1970年初夏撰寫〈朱子學提綱〉一篇，冠於書首，「撮述書中要旨，並推廣及於全部中國學術史」，「以見朱子學術承先啟後之意義價值所在」；²¹書末又附〈朱子學要略〉及索引，方便讀者參考、研究。錢先生認為：

朱子讀書多，著書多，所著書中所牽涉之問題多，此三多，為古今諸儒所莫逮。……若欲求明朱子學之真相，則莫如返求之朱子之書。²²

可知本書的旨趣，即在「以讀朱子之書，求朱子之學」，²³並連帶解決朱熹死後七百多年來學術史上爭論不休、疑而未決的問題。全書內容分三方面：思想包括理氣、心性兩部分；學術包括經學、史學、文學三部分，其中經學又分《易》、《詩》、《書》、《春秋》、《禮》、《四書》等，並附校勘、考據、辨偽諸篇及游藝格物一篇。介於思想與學術之間的部分，有朱子評述濂溪（周敦頤）、橫渠（張載）、二程（程顥、程頤）各篇，並評及程門、五峰、浙學，又別著朱陸異同三篇、關禪學兩篇等。

余英時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中，提到哈佛大學教授楊聯陞很推許這部著作。余先生說：

《朱子新學案》出版，他（楊聯陞）讀了提綱之後便已讚歎不已。他對我說：錢先生的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像這樣的提綱，胡適之先生恐怕是寫不出的。楊先生並不博治思想史，但是他的批評的眼光一向是很銳利的，這種私下閑談，不帶絲毫客套的成分。²⁴

「博大精深」，所指無疑是錢先生學術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同時也是指《朱子新學案》這部巨著。

略談錢賓四先生的學問特色

錢賓四先生的學問，可當得上「博大精深」四字的形容，再加上他的著作甚為浩繁豐盛，要從中歸納他的學問特色，猶如以蠡測海，不會周全。姑且就個人所見，試選幾項談談，聊作舉隅。

一、長於折衷與判斷

錢先生在1939年，曾寫了一封信給顧頡剛，信中談到自己和顧氏的學問特點。這封信抄錄在《顧頡剛日記》裡：

弟與兄治學途徑頗有相涉，而吾兩人才性所異則所得亦各有不同。妄以古人相擬，兄如房玄齡，弟則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謂房君善謀，杜君善斷。兄之所長在於多開途轍，發人神智。弟有千慮之一得者，則在斬盡葛藤，破人迷妄。故兄能推倒，弟則稍有所得，多在於折衷，在於判斷。²⁵

錢先生在信中指出，自己與顧氏的治學途徑有互涉的地方，但才性、所得則各有不同。他以房玄齡擬顧氏，以杜如晦自擬，前者「善謀」，後者「善斷」。顧氏的所長，是「推倒」和「開拓」，即能「多開途轍，發人深省」；自己的所長，多在於「折衷」和「判斷」，即能「斬盡葛藤，破人迷妄」。這是錢先生長久自省、觀察所得之言，因此顧氏在這封信後加了這樣的按語：

老友之言當有其積久之觀察，錄之於此，以待他日之論。²⁶

顧氏在《日記》中對錢先生以「老友」相稱，當然不是虛飾之詞，而錢先生對不是真正相知、相契的朋友，大抵也不會作這樣自信、坦率的比擬和評論。

錢先生學問淵博深厚，他的重要著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折衷眾說、掃除迷妄、斷以己意的考證。考證須以博採資料為基礎，但判定去取，抉微闡晦，就要具有深透、高明的識力。原來錢先生年輕時，在識力方面已有很好的表現。嚴耕望先生在〈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這樣說：

先生為學善師法，善變化，善新知，勇創見，而能悉心追求，每從細小事故中徹悟大道理。如此種種，均在任教小學時時表露無遺。²⁷

「每從細小事故中徹悟大道理」，這就是識力的表現。到了後來，錢先生更因讀孫詒讓《墨子閒詁》一書，深歎孫氏讀書精博、舉證詳確，因而開始「游情於清代校勘考據訓詁之學，力求精進」，²⁸ 提升了自己的考證能力。談考證，如識力不足，就難以在「折衷」、「判斷」方面有出色的表現。錢先生論著的光輝，與他的超卓識力是分不開的。

二、不立門戶，重視博通

錢先生治學淹通經、史、子、集四部，對傳統學術各領域都有深入研究，而且都有出色的表現。不過他的治學主線，應該是學術思想史，而且《國史大綱》又是許多人所稱道的名著，因此學界中人，一般視他為史學家。其實史學的範圍，不足以概括他的學問。錢先生常說，在中國學術史上，通儒的地位往往在專家之上。所以他一生治學，實以求取博通中的專精為目的。試以他的重要著作為例，《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朱子新學案》等著作，固然給人的印象是博通中顯示專精水平的學術思想著作，而《國史大綱》就有發揚國家民族精神的元素，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對讀者有很大的思想啟發。這種治學取向，應該是通儒治學「見其大者」的本色。

凡稱得上通儒的學人，都能破除門戶、力主兼通。錢先生在一次學術演講討論會上這樣說：

須知做學問應先有一廣大基礎，須從多方面涉獵，務使自己能心智開廣。若一意研究史學，而先把文學忽了；又若一意研究文學，而先把史學忽了；又若一意研究思想，而不知歷史，不通文章，如此又何能學得成？²⁹

他又說：

學問入門，正應該從各方面都有一番探究。……廣度愈開闊，然後深度愈邁進。³⁰

上述意見，正可說明錢先生治學很重視博通。重視博通的錢先生，當討論經學問題時，主張破除門戶之見、通諸門戶為一家；³¹當討論史學問題時，則主張擴大視野，務大體，貴能上下古今識其全部，再求會通。³²錢先生不願意成為新儒家的一員，因為他一生堅持：論學不立門戶，治學以博通為取向，不肯專守一隅；論者因而推許他是二十世紀國學界的通儒。³³

三、文化為本位，儒學為宗主

錢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歷史研究，特別是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最為突出，創獲也最多。因為他一生的治學，實以文化為本位，他認為研究歷史，實質上是研究歷史背後的文化。錢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中說：

中國文化，表現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我們應從全部歷史之客觀方面來指陳中國文化之真相。³⁴

他在〈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中又說：

一國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種各樣的生活，加進綿延不斷的時間演進、歷史演進，便成所謂文化……所以講到文化，我們總應該根據歷史來講。³⁵

治學既以中國文化為本位，所以他研究歷史的著作特多，而且往往涉及諸子學、經學、玄學、佛學、理學、清學等學術思想史的領域。余英時先生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中就指出，錢先生「一生的主要貢獻是在指示我們怎樣去認識中國的文化系統及其流變」。³⁶他對錢先生學問的概括，我以為是準確的。

凡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治學，必然會以儒學為宗主，錢先生也不例外。有人或許會抗拒、貶斥儒家思想，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兩千多年，長久以來已成為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表現在歷代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錢先生認同這個事實，同時也不諱言自己的思想其實深受儒學所影響。³⁷他在《宋明理學概述·自序》中這樣表白：

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嘗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厄，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矩矱，時切其嚮慕。……自問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賜。³⁸

這篇〈自序〉為宋明理學撰寫，內容不免專為宋明而發，其實錢先生所嚮慕的儒學，與先秦、兩漢以至宋明怎能沒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從〈自序〉的表述，我們不難明白錢先生的治學重心，為什麼會在學術思想史特別是儒學史方面，佔了最重要的分量。³⁹

四、以史治經，以經證史

在本港，有不少人研究經學，有更多人研究史學，但真正兼通經史、以史治經的人並不多，錢先生應該是「不多」中的一位。他的早期著作《國學概論》本為當時中學授課而編寫，並標舉「國學」之名，但內容其實是：

於每一時代學術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闡發，其用意在於使學者得識二千年來本國學術思想界流轉變遷之大勢，以培養其適應啟新的機運之能力。⁴⁰

可知他的撰述旨趣，是從史學的角度來談論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所以在本書第一章〈孔子與六經〉中，他不是就經學談經學，而是引據經史資料，用綱目附小注辨證論難的形式，來談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所收四篇論文，內容全為兩漢經學今古文問題而發。錢先生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中說：

經學上之問題，同時即為史學上之問題，自春秋以下，歷戰國、經秦迄漢，全據歷史記載，就於史學立場，而為經學顯真是。⁴¹

錢先生更指出，「夫治經終不能不通史」，例如主張今文經學的龔自珍、魏源、康有為、廖平等，他們的意見，都涉入歷史範圍，就史以論經。只因為他們都「先以經學上門戶之見自蔽」，才會出現「顛倒史實而不顧」的問題。⁴²

錢先生治經的「史學立場」，使他超越門戶之見，使他可以順利解決經學今古文的一些重要爭議，同時也讓他能夠理解、欣賞以史治經、以經證史的研究論著。例如牟潤孫先生〈釋論語狂簡義〉一文，除詳列諸家注疏《論語》之說外，還引述唐代劉知幾《史通》卷四〈斷限篇〉和卷八〈書事篇〉，指出劉氏雖非經師，「猶知漢魏經師之舊義，論史書體制，兩引狂簡以喻著史者之濫載失裁」，其說「可以解經」。⁴³ 錢先生在致牟先生函中，對此文的評語是：

〈釋論語狂簡義〉拜讀，甚佩。得《史通》為證，更見圓滿也。⁴⁴

據說錢先生在 1954 年邀請牟先生從臺灣大學來新亞書院任教，就是欣賞牟先生所撰寫的以史治經、以經證史的論文。

五、溫情與敬意的撰述

錢先生《國史大綱》一書，內容多具創見，章節標目，每能點出各時代的動態和特徵；論一代大局，亦能以數語切中事機，精悍絕倫；書前的〈引論〉，陳寅恪先生評為近世一篇大文章。⁴⁵ 在〈引論〉之前，更有四項對讀者的提示，其中兩項云：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隨附一種對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之溫情與敬意。⁴⁶

上述提示，我以為不應只限《國史大綱》的讀者，也應包括古今有關中國歷史撰述的研讀者。

而有志研治本國歷史文化的學者，也應心中常懷「溫情與敬意」，否則就會對本國歷史文化抱有極大反感，並把眼前種種的缺失，包括自己的惡劣行為，都歸罪於古人。

錢先生以「溫情與敬意」提示《國史大綱》的讀者，自己也正是滿懷著「溫情與敬意」來撰寫《國史大綱》。他在十六歲時（1910年）已因梁啟超〈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一文的啟發而產生了較強的愛國思想與民族文化意識，因而要深入中國的歷史文化，去尋求中國不會滅亡的根據。⁴⁷ 而他在撰寫《國史大綱》時，正值日軍侵凌、情勢逼迫、艱苦抗戰之際，書中自然寓涵著特強的民族意識。其實錢先生一生撰著，包括《國史大綱》前或後的學術思想研究，都是懷著「溫情與敬意」來下筆的。這與他以文化為本位、以儒學為宗主的治學取向，可說是一脈相通。余英時先生說錢先生「一生為故國招魂」，⁴⁸ 如果對自己的國族、對自己國族的歷史文化沒有「溫情與敬意」，錢先生又怎會盡瘁一生，為「招」中國之「魂」而不斷講學、撰著？有人或許會問：心存「溫情與敬意」的撰著與講學，會不會影響了學術辨析應有的客觀？錢先生治學，一向建立在嚴謹的考證基礎上，以〈劉向歆父子年譜〉為例，文中何嘗沒有顯示「溫情與敬意」？但他排比史事，一一指明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不可通者二十八處，就是客觀有據的辨析。至於錢先生情敬兼有的講課和演講，內容都是言而有據，或是對古代典籍和時人論著研讀後有所得之言，並非徒逞臆說的「高論」。

「寄情極深」的早期教學

我在 1988 年一個語文教學研討會上，宣讀過一篇論文，題目是〈錢賓四先生談寫作教學〉，內容主要是引述錢先生《師友雜憶》中的資料，討論錢先生談寫作教學的意見。⁴⁹ 錢先生是著名學者，也是大學教授，這是許多人所熟知的。但從他的自述，我們知道他有很豐富的中小學語文教學經驗，特別是關於寫作教學方面的經驗。據錢先生所述，他指導學生寫作的方式約可分為七項：1. 普通命題寫作；2. 聽寫練習；3. 默寫練習；4. 實地觀察報告；5. 抽象描述；6. 對比描述；7. 見聞憶述。在指導學生寫作的過程中，錢先生很重視實地觀察和實際驗證，又在寫作前後有活動，而且把寫作課變得趣味化和生活化。例如他指導學生實地觀察松風與普通風、黃梅雨與普通雨的不同；又例如人人都要喫午飯，他就以〈今日的午飯〉命題，要學生各自描述午飯所喫的東西，而描述中須有曲折，等等。⁵⁰

我這篇文章發表後，曾寄贈一份給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的張學明教授。張教授複印了一份把它寄呈遠在臺灣的錢師母胡美琦女士。後來錢師母在覆張教授的一封信（1995 年 6 月 14 日）中說：

李學銘先生一文，我很感興趣。錢先生生前對他自己這一段小學語文教學生涯記憶深刻，也懷念不已，至老難忘。一般人讀《師友雜憶》，只注意他後半生，而忽視他寄情極深的年青教學生涯。所以我讀李文，很感親切。⁵¹

錢師母對拙文表示「很感興趣」和「很感親切」，使我有意外之喜。由於她不知道我是錢先生在農圃道任教時的學生，⁵² 所以稱我為「先生」，實在不敢當。我以為，錢先生「寄情極深的年青教學生涯」尤其是他對中小學語文教育的貢獻，將來還可以稽鈎有關資料，多談一些。

餘論

談錢賓四先生的生平和學問，我們很自然會想起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的創辦，更會想

起錢先生所提倡的「新亞精神」。新亞創辦於社會動盪、物質匱乏的五十年代，以維護、弘揚中國文化為宗旨，當時這樣做，有時會受到一些人不必要的訕笑或擠壓。在這種情況下，錢先生倡言「新亞精神」，無疑有自勉和鼓勵新亞同人（包括同事、學生）的用心。談論「新亞精神」的人很多，人人有各自的理解和解說，因此內容、措詞並不完全一致，甚至錢先生、唐君毅先生、張丕介先生、趙冰先生以及其他老師、學長對「新亞精神」的解說，也總有些出入。不過只要不失中心原意，其實怎樣解說和怎樣發揮都可以。

我們要切實掌握「新亞精神」的中心原意，我以為可以從錢先生所撰《新亞校歌》歌詞和他與新亞諸先賢所共同擬訂的《新亞學規》去瞭解。⁵³ 根據歌詞和《學規》的提示，「新亞精神」或可這樣理解：1. 對中國文化要有傳承、發揚的自覺和信心；2. 胸襟廣闊，包容性大，在艱苦、困乏的環境中，仍然滿懷希望、熱誠，向目標努力奮進；3. 為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融通合一。

能作上述理解，並勉力實踐，「新亞精神」可說是無時無處不在，我們實在不必憂慮「新亞精神」是否已亡。錢先生曾說過：

古來大偉人，其身雖死，其骨雖朽，其魂氣當已散失於天壤之間，不再能搏聚凝結。然其生前之志氣德行、事業文章，依然在此世間發生莫大之作用。則其人雖死如未死，其魂雖散如未散……。⁵⁴

上述這番話，既可適用於錢先生自己，也可適用於錢先生所提倡的「新亞精神」，更可適用於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這一集體。擴而大之，每一集體的成員，只要有人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只要不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恥，就不難對自己國族的祖先、前賢、長輩逐漸產生「溫情與敬意」，有了「溫情與敬意」，就自然會有自覺和信心，去克服困難，去傳承、發揚自己國族的文化和文化中的精神。而且，每個人、每所院校、每個不同名稱的集體，都會有不同階段的進程或發展，都會面對不同階段、不同程度的困難，只要有足可標榜、不失中國文化本質的「精神」作為引領，大家就會滿懷希望、熱誠，向目標努力奮進。

錢先生撰寫《新亞校歌》歌詞和新亞諸先賢共同擬訂《學規》時，以處境非常艱苦、困乏的新亞人為勉勵對象，自是應有之義。不過到了今天，講論「新亞精神」的新亞人，實不必自立門戶，把自己局限在新亞這一個集體之內；而講論「新亞精神」的中大人以至社會各界人士，也不必以本不存在的門戶為門戶，自外於「新亞精神」。「新亞精神」只不過是愛重中國歷史文化、能包容、不畏艱苦、為學做人並重、不斷奮進的精神而已。我這樣說，或許較能符合錢先生一生治學主張「必先破棄」「一切門戶之成見」的提示罷！⁵⁵

2014年8月完稿

注：

01. 參閱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師友雜憶》第一至十四節，頁33-238；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上篇，載《怎樣學歷史：嚴耕望的治史三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243-254。
02. 參閱錢穆：《師友雜憶》，第十五節至二十節，頁239-332；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上篇，同上，頁254-261。

03. 參閱《錢穆先生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新校本的出版說明。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的《全集》本名《錢賓四先生全集》，新校本改為今名。
04.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5年初版後，有香港大學 1956年增訂版、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6年再版。
05.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 100。顧書的初版由南京勝利出版公司出版（1947年）。
06.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 82。
07.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7年初版後，有臺灣商務印館 1957年再版及 1968年第四版、北京中華書局 1984年再版、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本。
08. 參閱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7年），上冊，〈自序〉，頁 1。
09.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 204。
10. 重慶商務印書館 1940年初版後，臺灣商務印書館 1952年再版、1974年修訂版、1994年再次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則有 1994年重印版。
11. 參閱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頁 81。
12. 同上。
13. 嚴耕望：《怎樣學歷史：嚴耕望的治史三書》，頁 218。
14.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同上，頁 252。
15.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先生師〉，載《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 11。
16. 同上，頁 11-12。
17. 香港新亞研究所 1958年初版後，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71年及 1978年再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1年及 2003年再版。
18.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第六冊，頁 350。
19.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 6-7。
20. 臺北三民書局 1971年初版後，有四川巴蜀書社 1986年再版。
21. 錢穆：《朱子學提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弁言〉，頁 1。
22. 同上，〈三十二·研究朱子學之方法〉，頁 215。
23. 語見同上。
24. 余英時：《師友記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 71。
25. 《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第四卷（1939年 7月 2日），頁 395。
26. 同上。
27.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上篇，載《怎樣學歷史：嚴耕望的治史三書》，頁 245。
28. 參閱同上。
29. 錢穆：〈關於學問方面之智慧與功力〉，發表於新亞研究所第六次學術演講討論會（1961年 11月 10日），原載《新亞雙週刊》第四卷十三期（1961年）；後載《新亞遺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頁 356。
30. 同上，頁 357。
31. 參閱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頁 6。
32. 參閱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附錄·略論治史方法〉，頁 153-155。
33. 參閱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載《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 26-31。
34.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臺北：正中書局，1953年），頁 5。

35. 錢穆：《國史新論》（1955年4月自印本），頁119。
36. 語見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35。
37. 參閱同上，頁39。余英時認為錢穆先生對儒家的看法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是歷史事實的層次；第二是信仰的層次。所謂「信仰層次」是指錢穆先生以儒家思想為人生信仰。
38.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年），上冊，頁2。
39. 參閱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載《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39。
40. 錢穆：《國學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年），〈弁言〉，頁1。
41.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頁6。
42. 參閱同上。
43. 參閱牟潤孫：《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增訂本），上冊，頁207-208。
44. 筆者親見錢穆先生致牟潤孫先生函原件，未刊。
45. 參閱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上篇，載《怎樣學歷史：嚴耕望的治史三書》，頁252。
46. 提示見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4年）上冊扉頁後，頁1。
47. 參閱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載《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17。
48. 語見同上，頁16-25。余文全篇即以「一生為故國招魂」一語為中心展開論述。
49. 參閱〈錢賓四先生談寫作教學〉，載《中文科課程、教材、教法研討會》（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101-111；後載《中國語文教學的現況與發展》（香港：學思出版社，1997年），頁300-313。
50. 參閱同上，頁304-310。
51. 筆者手邊有原信複印本。
52. 筆者在1957至1959年，曾先後修讀過錢先生講授的「中國通史」、「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化史」。「中國通史」本由程綏楚先生任教，但只教了上學期（1956年秋），因事離職，下學期（1957年春），由錢先生接教。錢先生講課時，錢師母一般會坐在教室最後一行靠近門口的位置。
53. 錢穆先生所撰《新亞校歌》手稿的影印本，見張學明、陸國燊、黎明釗、劉國強（編）：《誠明古道照顏色：新亞書院五十五週年紀念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06年），頁279。此外，我們要具體而深切瞭解何謂「新亞精神」，更應進一步細讀《新亞學規》，《學規》凡二十四條。參閱上面提到的《新亞書院五十五週年紀念文集》，頁277-278。
54. 錢穆：《靈魂與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15。
55. 語見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頁7。

本文摘錄自《貫古通今 融東會西：扎根史學五十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2016年。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版權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